第39卷 第2期
2002年3月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Vol.39, No.2
Mar. 2002

来稿撷英

"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

——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

张中宇

一、关于"风情"的争论与分歧

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这是白居易本人对《长恨歌》意义最直接的诠释。但是对其中"风情"的理解,却颇多歧异。

爱情说把"风情"等同于男女恋情,把"有风情"视为表达爱情主题。例如马茂元、王松龄认为,白居易"把《长恨歌》与自己讽谕诗的代表作《秦中吟》并列对举,明白宣言《长恨歌》写的是'风情',……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1]。袁行霈也持这一观点,"他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可见《长恨歌》主要是写爱情。"[2]类似论述并不少,大多把"风情"与作为"正声"的讽谕诗相对作比,"《新乐府》乃'诗言志'的'正声';《长恨歌》是'诗缘情'的'风情'诗;前者是'为事而作',后者是'为文而作''为情而作'"[3]。

但也有学者不赞成爱情说,在他们看来,"风情"只不过是等而下之的"风流韵事"而已,不能与"正声"相提并论:"白居易认为只有《秦中吟》之类的讽谕诗才符合古代诗人'六义四始'之旨,才够得上所谓'正声'也就是今人所谓讥刺性、政治性的作品。至于《长恨歌》,则白居易编集时并没有把它收入讽谕诗里,不认为'正声'而止是'风情'之作。"[4]既然"风情"连爱情都算不上,表达爱情主题当然无从谈起。应该指出,这些论述注意到《长恨歌》与作为"正声"的讽谕诗的不同——这一点也正是白居易在自述中强调的,不足在于武断地"以今逆古",不加分析地以今人的想法简单推断白居易所述"风情"的本意。

周明也不赞成《长恨歌》表达爱情主题之说,但反对把"风情"理解为"风月之情"、"风流韵事",他认为,"结合《诗大序》来看,'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说的就是风、雅两种诗歌。……'一篇长恨有风情'二句讲的就是《长恨歌》具有风诗之性情,《秦中吟》接近雅诗之声调。这两句诗互文,总的意思是说自己的诗具有风雅比兴的内容。由此看来,把'一篇长恨有风情'作为《长恨歌》歌颂真挚爱情的作者'自述',就难以成立了。"[5]周明指出"风情"应指"风诗之性情"而非"风月之情",比简单的"以今逆古"有所前进,但他论述的要点在于"互文",即否定《长恨歌》与《秦中吟》或讽谕诗的区别,认为"白居易作《长恨歌》和《秦中吟》都是他的为时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的实践","不能由《与元九书》中的个别句子得出白居易不喜爱《长恨歌》以及《长恨歌》没有讽谕意义的结论"。[5]这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总的来看,认为或默许"风情"近于甚而等于风月之情,乃至于认为是"风流韵事的别名"者,为数较多。即使认为"风情"指风诗的情调,由于我们今天认为风诗属于民歌,且其中大部分是有关爱情的诗歌,所以基本上还是倾向于指男女恋情。因而,"一篇长恨有风情"事实上成为爱情说的有力证据。而由于"有风情"是白居易的自述,所以"不容置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看法均没有仔细考察"风情"在汉唐时代的特定含义,尤其是特别强调诗歌政治功能的白居易的真实想法。在有着近三千年时间的漫长的封建社会,"风情"的含义并不简单。不应忽略今天与汉唐时代存在的巨大的"时间差",即生活在唐代的白居易,在距今一千余年的时候阐释"一篇长恨有风情","风情"在当时被赋予了何种意义。只有这样,才可能准确理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

二、"风情"考略

从白居易的自述来看,由于"风情"、"正声"在前后两句诗中相对应使用,所以这一自述的含义,应该与对《诗经》相关诗歌的理解有关。《诗大序》说:"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此后,"正

声"一直作为与《诗经》的诗歌精神有关的特定的文学批评概念使用。周明说："大家知道，白居易是以继承《诗经》的'六义'为己任的。"[5]这个评价是正确的，《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受到白居易的高度推崇。这样，白居易评价自己的诗歌时，与《诗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就毫不奇怪了。同时不难看出，《诗大序》对作为"正声"的雅诗的评价，也符合白居易的《秦中吟》等讽谕诗的特点——"言王政之所由兴废"。白居易有意举讽谕诗之《秦中吟》为代表，秦即今陕西一带，正是周王朝的政治中心，即王畿之地。可知白居易所说的"正声"，应是指《诗经》之雅诗无疑。"风情"与"正声"对应，它的意义也是清楚的，即周明所说的"风诗之性情"。

现在我们认为，所谓风诗，实在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而已。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是，需要注意一个"时间差"问题。不错，《诗经》里的风诗，在周王朝当时，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只是民歌。但是，一个原因是质朴的民歌虽然不具有直接的政治目的，客观上却可以反映民风民情("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政治措施的效果；另一个原因是风诗经过了编辑者的选择，字句篇章也作了增删，编辑者基于当时的需要，恐怕也强化了风诗的政治目的。换言之，风诗本是民谣，但选编的行为首先赋予了它一定的政治功能。"诗三百"编成以后，在春秋时代，社会上即广为流传。因为学"诗"不但可以丰富学识，还"可以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借以言志或讽谏"[6](P21)。《左传》中就记载了不少春秋列国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情形，虽是"断章取义"，但说明"诗"在当时确实具有了超出其作为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相传曾经"删诗"的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也可以证明，"诗三百"在它编成之初，功能即已大大扩展，远远超出其作为一部诗歌集的影响，政治因素明显介入。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诗三百"及其中占大部分的风诗功能的扩展，还主要在于从外部扩大它的应用范围，尽管时有牵强附会，却没有着手从内部对之加以"改造"或进行某种"认定"。真正不加分辨地断定风诗即婉转含蓄的政治诗的，始于不遗余力搜求微言大义的汉儒。经过秦火之后，虽然进入汉代，但大概知识分子更不敢直接谈论政治，于是把目光转向当时已被奉为经典的《诗经》。在其已有的、被外界赋予的政治性的基础上，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更是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诗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可以看出，到了汉儒手中，风诗的政治作用已经被明显夸大，"风"也被赋予婉转以"讽(谏)"的含义。

从此，《诗经》里的风诗在以后历代的主流思想中，均再未作为比较纯粹的民谣来看过，风诗被不断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政治教化意义。唐代学者，尤其是强调诗文政治功能者，毫不犹豫的承袭了汉代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唐初为了传学和取士有统一标准，唐太宗令孔颖达编撰《毛诗正义》，含毛传、郑笺、孔疏等。《毛诗正义》属于官方文献，代表唐代主流意识形态。《诗大序》说："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孔颖达疏云："一国之政事善恶者皆系属于一人之本意，如此而作诗者谓之风……一人者，作诗之人。其作诗者，道己一人之心耳。要所言一人，心乃是一国之心。诗人览一国之意以为己心，故一国之事系此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行风化于一国，故谓之风。"[7](P272-273)孔疏并秉承汉儒说："风训讽也，教也。"在孔颖达看来，"风"与"雅"的区别，不过在于区域大小，"雅"诗"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风"诗"所言者直是诸侯之政"，都是从不同角度或不同层面上表达政治内容的。唐初制定的这些教化方略、制度，是贯通整个唐代的。从唐代主流思想来讲，可以明显看出，风诗的政治教化意义是进一步强化了。到宋代，欧阳修、郑樵，理学家朱熹等人始对"刺诗"之说有所怀疑，但很快即被视为"大逆不道"，"即使是身为理学宗师的朱熹也未能免受讥评"。[8]此后至清代，"刺诗"说仍为封建时代的主流解释，"'诗'之真价值遂历二千余年而不明"[9](P85)，可见汉唐以来形成的"刺诗"说的强大力量。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其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不应该认为，今天我们还风诗的本来面目，确认风诗大多是咏颂男欢女

爱的纯情诗歌,汉唐人也作如是解。因为汉代《诗经》立为经典之后,在当时的思想氛围之下,风诗是决不仅仅作为一般的"风情"甚或"风月"、"风流韵事"之诗来看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立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唐代又沿着汉儒的方向更进一步——而白居易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理解风诗,并称"一篇长恨有风情"的。不管今人是否赞同,汉唐时,原本属于民间歌谣的风诗,的确被人为地赋予了太多的文学以外的意义。"一方面,应该还《诗经》以文学的身份,不必理睬'后妃之德'一类说教……另一方面,对《诗经》、《左传》,也不能忽略它们在过去二千多年里,曾经负载了远远超过自身使命的额外负担。"[10]封建社会里《诗经》身上长期承载的这份"额外负担",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客观存在,也是解读白居易"一篇长恨有风情"这一自述的关键。

三、白居易的态度与"一篇长恨有风情"之讨论

孔颖达关于风诗与雅诗均为政治诗,只有地域广、狭的区别,并非仅仅唐代学者一家之言,而是他以国子监祭酒身份受命于太宗,为官学传授五经及开科取士制定的"国家标准","颁于天下,每年明经依此考试"。[11](P6)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就是以此标准应试的进士之一,汉唐以来关于《诗经》及其"风诗"的主流思想对他的影响,应当不难想象。

白居易接受风诗具有政治目的的观点,除了汉儒以来及至唐初即已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主流舆论氛围的影响这一重要原因,也和他的思想倾向有关。我们知道,在中国诗歌史上,如此明确、坚决和身体力行地倡导诗歌的政治功能,既形诸系统的理论,又致力于创作者,白居易都是十分突出的。以今天的观点来看,白居易显然过分夸大了诗歌的政治作用,而多少有些忽视文学自身的价值和功能。然而,整个封建社会,中国文学的情况大致都是如此。生活在唐代的白居易,只不过因其作为政治人物和文学领袖,因其政治倾向和文学主张的需要,对此更加以强化而已。

在《策林·六十九》中,白居易说:"故闻《蓼萧》之诗,则知泽及四海也;闻《禾黍》之咏,则知时和岁丰也;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闻'谁其获者妇与姑'之言,则知征役之废业也。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风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12](P1370)在《进士策问》等文中,白居易也有类似论述。从这些论述来看,白居易并不像汉儒那样,拘泥于搜求某诗"颂后妃之德"或"刺襄公"之类穿凿附会,而是更重视从整体上强调风诗的认识价值及其对治理国家的指导价值。从这一点上说,白居易的视野更广,比汉儒小心翼翼的搜求更为直接,也更理直气壮地强调了风诗的政治意义,而更不把风诗视为一般的民谣,情诗,或者仅仅视为"隐刺"之类末技。

可见,白居易一方面接受了汉儒流传下来的观点——风诗并非纯粹的民歌,而是婉转含蓄的政治诗——尽管不无偏颇;另一方面,却并不过多理会汉儒偏于牵强的"隐刺"之说,而把目光直接指向文学现象中蕴涵的政治价值。如果说汉儒醉心于搜求关乎个人的"隐刺"的话,白居易则是不遗余力地发掘风诗之与公众有关的政治方面的信息。虽然仍不免夸大了风诗的政治功能,但比之于汉儒,无疑较为科学。整体而言,白居易对风诗政治意义的强调,也超过汉儒。"故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风之得失,由斯而闻也",这是白居易对风诗的基本评价。就具体诗歌而言,白居易也不仅仅考察它本身的意义,尤其仅仅在文学方面的意义,而是明显地指向它的政治价值。

现在我们来讨论白居易的自述。白居易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诚如前面的论述,"正声"既指雅诗,"风情"既指风诗,那么,"一篇长恨有风情"的意义就十分清楚、明确,是说《长恨歌》具有"风诗之性情"。而"风诗之性情"在汉唐时代具有不同于今天的特殊涵义,在当时几乎就是"婉转以讽"的代名词。由于白居易认同,并且强化了这一观点,因而,说"一篇长恨有风情",无异于声明《长恨歌》是一首婉转的政治诗——如同汉唐时理解的《诗经》之风诗,只是不像《秦中吟》等专意于政治的讽谕诗那样直露和尖锐。因此,可以认为,白居易的自述不但不能作为《长恨歌》表达爱情主题的依据,反而应是《长恨歌》表达婉转以讽政治主题的重要诠释。

从白居易自己的动机来看,持讽谕说者认为《长恨歌》表达与其讽谕诗具有相同风格的无情揭露、批判和进行强烈抨击的主题,并不符合白居易的原意,"有风情"的《长恨歌》与"近正声"的《秦中吟》等讽谕诗毕竟不同。但另一方面,白居易说:"闻广袖高髻之谣,则知风俗之奢荡也。"《长恨歌》

类似描写并不少："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渔阳鞞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按白居易的思想，《长恨歌》中这些"广袖高髻"的描写应该透露什么信息呢？仅仅是爱情故事？显然不可能。因为《策林》作于元和元年，同年底，白居易即作《长恨歌》[13](P1598－1599)，其时思想应是一致的，正是身体力行其政治与诗歌主张的前期。此外，《长恨歌》中还有更为直露的描写，如"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等。荒废朝政、毫无原则的裙带关系这些重大问题，十分引人注目地出现在《长恨歌》中，也应该不会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的烘托或渲染。以白居易的思想倾向，不可能认为帝王爱情比唐王朝的繁荣、稳定更为重要。选择最有争议、包含政治因素最多的"爱情"题材——不仅仅是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故事，而是酿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灾祸(安史之乱)的重大事件——来表达一个"纯情"主题，对白居易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白居易自述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如果历史地解读其涵义，即已阐明《长恨歌》不仅仅描写风月之情抑或风流韵事。反过来说，如果只是描写风流韵事或爱情，白居易应该不会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尤其不会在唐代使用"风情"这样一个在当时具有特定涵义，明显排除了仅为情诗的重要的文学批评术语来评价《长恨歌》。

当然，作者的主观动机有时会与作品的客观效果之间出现差异。即尽管白居易主观上希望把《长恨歌》写成"婉转以讽"的政治诗，但其客观效果可能未必如此，这也是《长恨歌》主题近年来争议颇多的一个问题。不过，作者的主观动机必然会相当程度反映到作品之中，并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主题，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关于《长恨歌》的客观效果——实际上主要就是爱情主题说——的论证，很难说有充分的理由。[14]而作为爱情说重要证据之一的白居易的自述，也并不支持爱情说。恰恰相反，令爱情说始料不及的是，"一篇长恨有风情"反而应为表达婉转以讽政治主题的重要诠释，至少白居易的主观考虑是如此。

参 考 文 献：

[1]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J]．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83，(1)：87－97．

[2]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3] 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J]．江西社会科学，1985，(3)：75－79．

[4] 黄永年．《长恨歌》新解[J]．文史集林，1985，(4)：179－206．

[5]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J]．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2)：21－22．

[6]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21．

[7] 孔颖达．毛诗正义[A]．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79．

[8] 莫砺锋．从经学走向文学：朱熹"淫诗"说的实质[J]．文学评论，2001，(2)：79－88．

[9] 胡适．答钱玄同[A]．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0] 董运庭．从《左氏春秋》到《左传》[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7，(2)：59－66．

[11]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A]．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12] 白居易．策林，六十九[A]．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3] 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A]．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4] 张中宇．《长恨歌》主题争论若干问题之管见[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1992，(2)：62－70．